

“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 综述

Overview of the Symposium “The Gugong Studies and the Court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秦弋然

Qin Yira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7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七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Overview of the Symposium “The Gugong Studies and the Court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秦弋然

Qin Yiran

2016年8月19至20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召开，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法国滨海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海内外三十余所研究机构和高校的70余位代表出席，共提交会议论文60余篇。

会议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主持，副校长朱光磊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词，他肯定了历史学院、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多年来的工作，并对南开大学与故宫博物院在未来深化合作寄予厚望。文化部原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教授致辞，对南开大学一直以来对故宫学的支持和推广表示感谢，并希望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教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研究员也先后发表讲话，表示故宫学的发展对于南开大学和故宫博物院都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希望更多的学者投身于故宫学研究。

此次会议采取了大会发言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与会学者围绕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史的各个领域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涉及故宫学理论与故宫博物院史、故宫建筑、故宫艺术以及明清宫廷典制、人物、思想、宗教、外交、宫廷生活、文献等多个方面。

一 故宫学理论和故宫博物院史

郑欣淼教授发表《关于故宫学的再认识》的讲演，回顾了故宫博物院发展史、学术史和故宫保护史，从三个维度上对故宫发展历程中的曲折反复和经验教训进行论述，指出以往故宫学术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研究的碎片化，二是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他强调，故宫学研究需坚持进步的观念与思维的创新，坚持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结合，树立开放、多元的合作交流的理念，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道路。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研究馆员发言的题目是《故宫学术的滥觞》。他立足于故宫学术的发轫期，将1912～1925年期间故宫区域内包括溥仪小朝廷、古物陈列所以及清室善后委员会这三个互有交叉的方面所开展的学术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梳理，提出故宫学作为一门正在定型的学科，在中国诞生于2003年，

但对故宫资料的著录、整理、研究,则发轫于民国初年。虽然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尚属草创,研究本身还不具备成为研究对象的充足条件,因而在理论方面无建树,但其开山之功应载入故宫学史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博中心的吴十洲研究员所撰《故宫开院留给了我们什么精神遗产?——纪念故宫博物院诞辰90周年》一文,对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的三个重要事件阐发了观点:第一,将末代皇帝溥仪与博物院一起保留下来的历史条件并不具备,驱逐溥仪出宫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第二,点查故宫文物的“绝对公开”原则为保存清室古物提供了思想武器与方式保障,也成为故宫博物院运作的基本原则。第三,“北伐”胜利后对故宫性质的讨论,不仅为早期的故宫博物院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在其日后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 故宫建筑

法国滨海大学跨文化化学研究所马骊教授《紫禁城:皇权符号的体现及其文化象征》论文,首先通过分析紫禁城的构建格局、构思理念、色彩装饰及其文化形态和哲学思想的体现方式,勾绘出一个清晰的宫廷版图。其次,她将紫禁城与法国凡尔赛宫在空间布局、内部划分与排列、内饰及园林设计的异同进行比较,认为两座宫殿是东西方不同宫廷政权符号的体现。最后,她探讨了两座宫殿对东西方宫殿建筑理念的影响,认为两座宫殿分别成为了不同文明的文化象征。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周乾副研究馆员发表了《故宫古建筑抗灾构造及抗震方法研究》论文,对地震作用下古建筑的典型震害特征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故宫古建筑的抗震优势及不足提出了合理的抗震加固建议。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王子林研究馆员《养心殿新证》论文提出,养心殿曾经是帝王的偏殿,在雍正时被逐渐改造成为一座集政务、宴息、礼神合一的场所,乾隆帝即位后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其空间形式更加多样化。养心殿还传达着帝王乾纲独断的为政思想和勤政亲贤、敬天法祖、以仁为本、无所倦怠的执政精神。

圆明园管理处尤李副研究馆员《释圆明园慈云普护之多神殿》,通过考察圆明园内慈云普护的陈设、布局和装饰,认为其中多神像的供奉体现出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交融,雍正、乾隆和嘉庆三帝园居时前往此地礼佛,实质上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同诉求。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罗晓翔副教授《制度史视角下的明代皇家陵寝——以孝陵为中心》论文,将目光放在明代皇陵的运作机制这一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问题上,通过对孝陵营缮、奉祀及戍卫事务的考察,揭示了其运营方式的复杂性和由此引发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冲突。

三 故宫艺术与工艺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马顺平副研究馆员《十五世纪前期明与帖木儿帝国的文化交流——以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所藏“牵马图”、“海东青”图为中心》,通过图像与文献互证,对两幅绘画的绘制及流传过程、文

化背景进行了阐论, 以此反映出十五世纪前期明与帖木儿帝国的政治关系及文化交流。

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王翬的登场:〈康熙南巡图〉的绘制背景与清初江南画坛的场境》论文, 结合王翬跟从王鉴、王时敏等人在艺术上极力精进, 之后被举荐至北京从事《康熙南巡图》的绘画主导工作, 直至最后返回江南的人生历程, 全面展现出康熙年间江南画坛代表人物的基本情况。

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张建华教授《乾隆帝与徐渭〈泼墨十二卷〉》, 结合乾隆帝跋文钤印及《清高宗御制诗文集》中有关徐渭的十二首御制诗, 对二人在精神层面的对话进行了阐述。

故宫博物院故宫出版社宋文编辑《〈荷塘晚钓图〉、〈庭院游戏图〉画中人物身份探析》论文, 通过对清宫《陈设档》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等档案的研究, 证实两幅画中的主人公应为道光帝的一对子女, 即隐志郡王与端悯固伦公主。

故宫博物院所藏《秋鸿》图谱册是绝无仅有的以水墨工笔画配合琴谱的传世珍品, 北京大学中文系黄卉副教授围绕这一内容, 发表了《故宫藏琴曲〈秋鸿〉图谱册考论》论文, 提出“琴曲《秋鸿》的创作者应为朱权而非郭楚望”, 并对琴曲的收录和刊传情况进行了讨论。对于乾隆与琴家唐侃的交往, 她认为虽然乾隆皇帝不甚解琴音, 但对听琴充满兴趣, 对唐侃鼓琴也有较高的评价。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李文君研究馆员《试说紫禁城中的蓝印章》对紫禁城咸福宫西配殿中的“克敬居”匾额使用蓝字的原因加以探讨, 指出咸福宫作为清中期皇帝居丧守孝的地方, 以蓝色书写匾额表示丁忧守制, 类似的蓝印章、蓝色琉璃瓦都带有同样的意味。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刊》编辑部赵中男研究员《清代中后期宫廷工艺品制作的变化及意义》一文指出, 清代中后期宫廷财政体制中实物和劳役成分减少, 宫廷工艺品生产和加工的市场化、专制王朝对宫廷制作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以及制作过程中的经济手段大为增加等, 都导致了清廷本身独立性、封闭性逐渐减少, 而社会化、世俗化程度相对增加。由此看来, 从前学术界评价清王朝落后、封闭甚至停滞的观点未必客观和公正。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张永江教授《古代青金石의 定名与清朝皇室青金石、催生石来源及使用之探讨》论文, 从有关档案、文献记述入手, 对清代以前对青金石的认识与青金石的定名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对清代皇室青金石的来源和使用作了详细论述。而对于皇室为何重视、珍爱青金石, 他认为不仅是出于满族对藏传佛教的情感尊崇, 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青金石的颜色与满族民族文化的心理底色相一致。

四 明清宫廷史

与会代表对明清宫廷史诸多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涉及典制、人物、思想、宗教、外交、宫廷生活、文献等许多方面。

(一) 典制类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肖立军教授《从〈明南京车驾司职掌〉看兵部对朝廷决策的参与》论文, 认为《明南京车驾司职掌》一书提供了南京兵部堂上官决策的若干材料, 有助于理解明代北京兵部的情况, 特别是为

探讨北京兵部堂上官决策问题提供了着力的线索。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明富教授发表了《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考论》论文,对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的种类和数量进行了统计,指出除了政府允许,加之宗室待遇优渥这两个原因,收藏御赐书籍和墨宝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也是明代宗室积极投身教育的重要动因。同时,修建文化教育设施也成为一些宗室舒缓藩禁压力、规避政治风险的行为方式。这些设施的额名,从侧面反映出皇帝和政府对于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

黑龙江大学历史学院胡凡教授《论明代神乐观的功能》,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认为明代神乐观乐舞生不仅负责国家祭祀的具体事务,同时也是国家最高的音乐教育机构,对王府以及属国用乐都有指导作用。此外,在国家遇有灾害之时,神乐观道士以道教祈禳形式为国家斋醮祈福,消灾免难。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德义教授、研究生单楷《秘书监与明代宫廷藏书管理之关系》论文,探讨了秘书监在藏书管理中的作用,认为明初废黜秘书监,使宫廷藏书长期无专人管理,不仅导致搜书活动减少,图书分类整理混乱,出借管理制度宽松,官员盗窃成风,也间接导致了明朝后期藏书的散佚。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李明阳发表《明代凤阳守备太监创设考》论文,提出凤阳守备太监最早设置时间是在成化八年(1472)太监高廉协同处理灾后事宜,而其故后宪宗仍差内官奉皇陵兼守地方,则标志着凤阳守备内臣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最终形成,不仅与成化以来地方灾异及流民运动大有干连,也是宣德以后皇陵太监威权日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刘玉《明代皇贵妃封号初探》论文,认为明代第一个皇贵妃出现于景帝时期;成化年间正式用金册金宝册封皇贵妃,确立了其“位亚坤仪,峻陟列妃之首”的地位;嘉靖时期,皇贵妃册封用金册金宝,贵妃用金册金印,进一步明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并被后世沿用。

厦门大学历史学院王日根教授、博士生章广《从〈钦定科场条例〉看清科举中的翻译科》论文,通过对翻译科从童试到乡试、会试的程序和规制的仔细梳理,指出雍正帝创立翻译科,目的是通过考试激励八旗子弟读书习学,提高他们的文化层次,亦保持其对民族文字的传承。因该科目专门针对八旗,渐渐成为调动旗人跻身官场的主要途径。至乾隆后期,逐渐因满人汉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式微。

(二) 人物类

对于景泰帝的研究,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林延清教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马渭源编审的论文都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林延清教授《左顺门事件与景泰帝即位》认为,左顺门事件有力地提升了朝臣抵御瓦剌入侵的士气,树立了朱祁钰的权威,有效粉碎了孙太后阻挠即位的企图,为其顺利即位打下基础。马渭源《从景泰“中兴”大背景来看“夺门”之变的定性问题》对景泰帝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举措进行了详细说明,又通过对洪熙至景泰时期主要经济数据的比对,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夺门之变”是一次绝对的历史倒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生玺教授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田澍教授则都选择了张居正作为研究对象。陈生玺《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论文,将张居正、高拱与宦官冯保之间既相互利用,又互相忌惮的权力争斗进

行了全景展现；田澍《“大礼议”视阈下的张居正夺情与政治剧变》则认为，“大礼议”进一步强化了以孝治天下的观念，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张居正在夺情事件中一味钳制舆论，严惩反对者，反而成为了他最大的政治失误，也导致了后张居正时代万历政治的混乱。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赵树国副教授《王直入阁考辨——兼论明人对内阁及阁臣身份、地位认识的变化》论文，结合实录、文集、笔记等史料，提出王直曾经入阁，但当时阁臣的身份、地位都不如后世正规，明人对王直入阁的叙述也因此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教授《崇祯生母孝纯皇后之弟刘效祖事迹考述——兼论明末外戚的权力与社会地位》，一方面梳理辨析了新乐伯刘效祖及其家族的基本事迹，并依据有限的几则史料对刘效祖的“养贍田”问题、“捐资济困”问题和“拨军修坟”问题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结合新乐伯在崇祯一朝的活动，剖析了晚明时代外戚势力与国运之关系，认为从明末外戚对国家土地、财政和军事的贡献看，明朝的灭亡实属必然。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陈支平教授《明末隆武帝及郑芝龙遗事摭余》认为，顺治二年(1645)隆武帝败亡后，之所以出现他出家为僧以及“未死”的传言，主要是一些明朝旧臣假借其名义号召南方臣民以图顽抗，也有一部分旧臣或是地方投机分子以此为个人谋利。而对于明廷曾建议郑芝龙北上抗清，他也指出：这一提议应是北京陷落、福王监国南京之后，由刘宗周提出，但从郑芝龙本人的基本原则来看，提议并无真正实现的可能性。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清宫史兴趣的逐渐浓厚，雍正帝即位之谜再一次被推到了讨论的风口浪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教授在《从大统授受看雍正即位之谜》论文中，对康熙帝的传位是口授还是遗诏、未命的内容和未命的见证人等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康熙帝没有书面遗诏，未命指定的接班人就是胤禛，而见证人隆科多的立场、选择与实际所起的作用，也成为了“篡位说”不可逾越的解释障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则从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涉及康熙帝传位的手稿入手，在《从西方文献看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论文中指出，这些资料虽然不是宫中目睹事实的最为原始记载，但结合当时康熙帝驾崩与雍正帝即位局面平稳的情形来看，似乎较为可信。

还有学者从性别史的角度对明清宫廷史中的女性人物进行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教授和博士生孙巍溥将讨论的中心聚焦在慈禧太后身上，其《性别视域中的家国权力——以慈禧太后为例》论文通过对慈禧太后与男性家长、阴性制度以及宗室势力之间多重性别关系的挖掘，探讨了性别权力下慈禧女主地位的形成、确立和维护过程，揭示出慈禧太后女主地位的确立，实质上是传统大家庭的性别文化所衍生出的权力关系在晚清政局上的投影。

(三) 思想类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朱冶讲师《〈圣学心法〉与明成祖的政治理想》的论文指出，因“靖难”得位的复杂政治背景，致使明成祖更乐于从编修理学书中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圣学心法》即是其政治理念的有力宣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展龙副教授《明代谣谚的舆论诉求与政府应对》论文认为，明代谣谚的

传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多元互动,但谣谚的迷惑性、传播性也时常引发社会混乱,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政治和法律等手段缓解舆论危机,维持社会稳定。

明中晚期,面对皇权高涨之下君臣罕有接触的政治困局,宦官势力在政治架构中的地位愈加重要,而皇帝、士大夫以及宦官三者之间复杂关系所引发的种种政治变革也是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兆丰讲师《“化宦”:明中期士大夫对宦官的新认知与行动》论文认为,士大夫利用宦官内书堂读书制度,落实并推行宦官教化,根本上反映出经世之学并未因君权高涨与心学流行而流于平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姚星《晚明皇权膨胀与官僚群体分裂——由万历辅臣子弟禁考案说起》,则由具体案例入手,着重分析了晚明皇权膨胀刺激下,官员集团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其应对方式。而对于官员内部裂痕产生的原因,她认为是由于群臣对皇权膨胀的认识并未达成共识造成的。

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罗东阳教授《清帝一统多元史观之形成与帝王庙扩容》,根据对顺、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更定历代帝王庙祀典之动机、依据和方案的分析,提出祀典在乾隆时的最终定型体现了清帝的“一统多元”史观,由此推演清朝的满洲特性和中国性或中华性的关系,前者应当是服从于后者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闫涛博士后《清朝皇子教育中文武特质的培养分析》论文提出,从王朝初创期的重武轻文,到盛世时期的文武兼备,文强武弱,再到王朝没落期的文强武弱,皇子们自身的素质决定着清朝每个阶段的国运兴衰,而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就要妥善解决满汉文化矛盾的现实问题。

(四) 宗教、外交类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孝荣研究员《佛教抑或伊斯兰教?也论郑和的宗教信仰》论文认为,郑和的宗教信仰是复杂而多元的,主要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这从郑和生平的种种活动中均有明确表现;其次是道教,主要是天妃信仰,这与他奉命出使西洋,长年海上航行有关;再次是伊斯兰教,主要表现在他履行伊斯兰教的五项功课上,但他并非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郑和身上所具有的复杂宗教信仰,与他本人的经历和当时汉地以佛教和道教为主要宗教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明清时期藏传佛教研究在此次会议中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陈楠教授《明代番经厂》,依据明清笔记资料,对明代番经厂的设置情况、俺答汗求取番经始末进行了整理论述,提出到了明中后期,番经厂的职司更多是服务于朝廷举办藏传佛教法事和为崇佛的内官宫女提供养老之处。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杜常顺教授《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论文,则对明代北京藏僧最为集中的三大寺院做了分析,认为大慈恩寺主要为格鲁派僧人驻锡之处,宣德时封为“大慈法王”的释迦也失及其弟子门人是其中的代表;大能仁寺藏僧主要来源于具有萨迦派色彩的临洮宝塔寺,明代宝塔寺开山端竹领占之徒裔在该寺最为显贵;大隆善寺藏僧中最为显赫者系景泰中受封为“大智法王”的班丹札释及其徒裔,大致属于噶举派。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曹刚华副教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与达天通理会晤再考》,通过爬梳汉藏文献,对达天通理与六世班禅的会晤过程进行了探究,认为双方于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初六在觉生寺会面,会晤内容多为经藏翻译校勘、佛教戒律等。此次会面虽然是秘密会见,但一切都在乾隆皇帝掌握之中,故而是

一次半官方半私人的不公开会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传承与重塑：万寿寺的历史记忆》论文，以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的祝厘活动为中心，指出万寿寺自明朝建寺起，就以佛事祝厘而闻名。清朝延续了这一传统，特别是乾隆年间两度为皇太后庆典重修扩建万寿寺，不仅引发了新的一波皇家祝厘，也通过庙市这一寺院的延伸，将皇家与民间、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连接起来。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沈一民教授在《亦失哈东巡奴儿干考述》论文中，论述了亦失哈东巡奴儿干前的东北格局以及此前明朝派往该地区的使者情况，提出从永乐五年（1407）至宣德八年（1433），亦失哈先后七次东巡奴儿干地区，此外还有二次未能成行的出巡。亦失哈的东巡，不仅巩固了奴儿干都司的统治，也确立了明朝对黑龙江下游及鄂霍次克海周边地区的统治。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明清时期历代帝王庙的演变与朝鲜使臣之认识》，论述了历代帝王庙从明洪武六年（1373）初创于南京，直至清乾隆时容纳帝王 188 位、名臣 79 位的发展历程，指出相对于明代朝天使，清代燕行使者对于历代帝王庙的描述更为细致，对帝王神位的排列记述也更为清晰，对于祭祀的时间与礼仪也有所载录，而对庙中所立明代诸帝神位则有着相当复杂的感情。

关注中朝交流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存阳研究员《学术偶像与中朝文化交流——以朴珪寿参与顾祠会祭为个案》的论文，从燕行使朴珪寿于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十一年（1872）两度参加顾祠会祭着眼，展现出中朝学人对学术的挚爱、文化的担当、两国危难与命运的忧患意识，体现出“学术偶像”在中朝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非凡的意趣。

（五）宫廷生活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兆裕研究员《明代皇帝所行弥灾礼述论》论文，首先对明代从洪武初至明末有记载的弭灾礼进行了分类梳理，其次对弭灾礼的程序和内容进行了讨论，提出明代皇帝弭灾礼的举行，基本是按照遣告、修省、露祷的顺序，躬祷郊坛的情况很少发生，最后他分析了弭灾礼的内涵和影响，认为弭灾礼既继承明代以前各时期形成的礼制形式，同时也是明代整体弭灾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皇帝在弭灾中的表现往往成为其是否爱民勤政的标志。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祥学教授和博士生林枚《明代宫廷香料消费述论》论文指出，明代宫廷香料主要来源既有各地土贡，也有域外朝贡以及直接采购，内府中设有专职负责香料的收储和使用，香料的消费主要有国家祭祀活动、赏赉与折俸、宫廷生活用香三类。王室贵族多方搜求上佳香品，对明代的社会生活与香料的传播，均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香料也成了明代封建统治走向的参照物。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朱亚非教授和硕士生张小雅在《清代宫廷御膳制度探讨》论文中指出，清代宫廷御膳主要由内务府、光禄寺及其下属部门负责，不仅皇帝日常膳食步骤十分讲究，清代宫廷的六次大宴也具有很强的制度规范性和极为明显的“满汉一体”色彩。涉及宫廷饮食的还有沈阳大学清文化研究所刘中平教授《清代宫廷生活简论》，通过皇帝后妃等的膳食制度、宫廷食谱、满汉全席、娱乐舞蹈演戏、游艺以及太监宫女的行为生活六个方面的论述，得出结论：清代宫廷生活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彰显

满族的特色,充分体现满汉文化的融合。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术学系吴美凤教授将目光转向了清代宫廷的器物制造和使用,在《宫中一切事务,仰承朕意——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看乾隆皇帝》论文中,通过乾隆谕旨对其如何掌控各项文物、器用或陈设的成造进行考察,同时结合乾隆为何毁金溶银成造大行皇太后的“御发金塔”以及乾隆时期的苏作家具与晚明时期的苏作家具在风格上的差异,对乾隆时期的内廷器用是否存在“满族汉化”的问题进行讨论。

在此次会议中,还有学者对宫廷生活经费进行讨论。北京联合大学三山五园研究院赵连稳研究员《圆明园经费来源问题初探》,通过梳理档案文献资料,发现圆明园经费来源主要有内务府拨付、圆明园经营所得、盐关与盐政上缴的盈余银、商人和官员捐献以及罚没等等,来源途径非常多样。而故宫博物院宫廷部滕德永副研究馆员则将目光放眼到整个清末,在《清季户部筹拨内府经费的指导精神》论文中指出,户部自咸丰朝确立的筹拨内府银两制度,是对既有的内府、户部互相独立的经济制度的一种调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务府的经济困境,又尽可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但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其国体决定了其效能的低下性。

社会医疗问题不仅是当代社会关注的热点,在明清史的研究领域也是后起之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余新忠教授《从宫廷到社会——中国国家医疗卫生的近代演变》论文,将研究贯穿明清两代直至近代,提出传统时期的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基本与民间社会无关,而民间社会的医疗也基本是依靠市场机制来自行运作和调节。直到清末,医疗卫生制度近代演变的大幕才徐徐拉开,国家开始创设面向社会的医疗服务和医学教育机构,从中不仅体现出国家和社会对民众生命和健康的日益关注,还有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医疗卫生背后的政治和文化。

(六) 文献类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徐泓教授《〈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校注》论文,逐条校读《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文本,指出其最主要引用的史源是《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石匱书》、《国榷》、《皇明大政记》和《三朝圣谕录》。虽然存在日期错置、文字错误、叙事不周以及点校本句读的问题,《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的编撰仍可谓中规中矩,尤其在选录史事时还颇有见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小林教授和博士生纪海龙《〈明史·后妃传〉记载纠误》,对《明史·后妃传》中存在的用字不当、称谓错误、记述有误、衍字以及史实交代不清问题进行了逐条正误,最后结合这类记载错误提出了在历史文献编纂学上的启示。

台湾大学历史系衣若兰副教授《从下户烈女到名媛贤母:官修明清史〈列女传〉的转变》,通过分析比对《明史》和《清史稿》中《列女传》在传记体例、传主姓名的写法以及传主出身和入传类型的差异,得出结论:旌表女性的制度由明清时代至民初,规定相对放宽,并逐渐强调对母职之褒扬,而这种选取类型的扩大也为官修史书对女性的记载提供了更多选择。

除此之外,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朱鸿教授《“明清古迹文物”与“明代宫廷史文献专题研究”课程的设计与教学》,回顾了这两门课程的开课背景,并与各位代表分享了自己关于课程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的种种心得体会。

会议闭幕式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研究员主持,徐泓教授、朱鸿教授、赵毅教授、陈支

平教授、常建华教授等分别回顾了故宫学和明清宫廷史研究的历史，对发展的现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其在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愿景和目标。胡凡教授、冯贤亮教授代表各自小组，向大会汇报了研讨情况。随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咨询部主任薛燕研究馆员向与会代表介绍了“集思共享 Crowd Sourcing 明代职官中英文电子词典翻译项目”，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推动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和标准化。

最后，南开大学故宫学和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主任何孝荣研究员致闭幕词。他对此次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指出本次研讨会层次较高，囊括了海内外故宫学和明清宫廷史研究方面的诸多知名学者，各位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新史料、新理论、新角度和新观点等方面都有颇多建树，在会议讨论环节，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有力推动了故宫学理论、故宫博物院院史、故宫建筑、故宫艺术和明清宫廷史等方面的研究。它的成功举办，对于今后开展故宫学和明清宫廷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与思路及启发，对于进一步推进故宫学研究向前发展也将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